

§ 古典文学研究 §

# 帝王优劣论的背景与意义

——以汉魏之际的帝王论为中心

王京州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24)

**摘要:** 帝王优劣论在汉魏之际的兴起与曹魏时期的君臣共论之风紧密相联系。《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是钟会对高贵乡公与群臣论议内容和过程的生动记载,《周成汉昭论》则是曹丕、曹植、丁仪同庭之下相互论难的产物。帝王优劣论的流播和影响则反映了汉末以降私人讲论之风的复兴:孔融《周武王汉高祖论》是对王充《论衡》相关内容的鼓吹和回应,曹植《汉二祖优劣论》、诸葛亮《汉二祖论》则是对仲长统《昌言》问题之论的进一步发挥。曹丕等人的《周成汉昭论》同时还是建安期间曹操威权日盛、流言四起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对“史论即政论”具有很好的诠释作用。

**关键词:** 帝王优劣论; 君臣共论; 私人讲论 《周成汉昭论》

**中图分类号:** I2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14) 01-0081-07

随着敦煌伯 2636 号文书《帝王略论》在学界所引起的关注和热议,虞世南历史比较的评价方式及其对“贞观之治”的推动作用等均得到了揭示,<sup>①</sup>然而其所受汉魏之际帝王论的深刻影响则尚未有人注意。此期较为完整的论文尚存七篇,分别出自孔融、诸葛亮、曹丕、曹植、丁仪、钟会等名家之手,共涉及夏少康、周武王、周成王、汉高祖、汉昭帝、光武帝等六位帝王。它们无一例外采用的是两两比较的方式,有的题目径称为“优劣论”。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论文在文献著录上尚有触目皆是错误,更遑论深入的解读和研究。本文以此七篇论文为中心,探讨帝王优劣论在汉魏之际兴起的时代背景,揭示论文背后的政治寓意,及其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双重意义。

## 一、帝王优劣论与曹魏时代的君臣共论之风

甘露元年(256)二月底,高贵乡公在太极东堂举行宴会,宴罢,又与群臣讲论礼仪,并开启了一个君臣都极感兴味的话题。据钟会《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记载“帝慕夏少康,因问颉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灭,少康收集夏众,复禹之绩,高祖拔起陇亩,驱帅豪俊,芟夷秦、项,包举宇内。斯二主可谓殊才异略,命世大贤者也。考其功德,谁宜为先?’”<sup>②</sup>出人意料地是,群臣与高贵乡公的观点大相歧异。参与议论的群臣包括侍中荀颉、中书令虞松以及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皆以汉高祖为优,而高贵乡公则对夏少康大加称赏。不过,第二天五人的意见又开始相左,荀颉和袁亮站到了高贵乡公的阵营,而崔赞、钟毓、虞松依然坚持原来的看法,并对夏少康与汉高祖之间的优劣进

**作者简介:** 王京州(1977—),男,河北沙河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12FZW008)

<sup>①</sup> 关于虞世南《帝王略论》的评价方式与历史价值,可参见瞿林东《说〈帝王略论〉的历史比较方法》,《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李锦绣《读敦煌P2636〈帝王略论〉文书札记》,见严耀中编《论史传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8-148页。

<sup>②</sup> 高贵乡公与群臣之间关于夏少康、汉高祖的议论,《艺文类聚》卷十二、《太平御览》卷八二所载俱非全文,且均题为高贵乡公《少康汉高祖论》。《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太平御览》卷四四五引《魏氏春秋》所载较为完整,其中《三国志》注引末句称“于是侍郎钟会退论次焉”,故严可均辑入《全三国文》,系于钟会名下,题为《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此处引自《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册,第134-135页。

行了更为深入地分析。令崔赞等三人无法认同于高贵乡公的原因,实际上仍出于前日面对诏问时产生的直觉“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之君,与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中兴之主岂能与创业之君相提并论?这是三人认为无须置辩的简单逻辑。但高贵乡公独辟新说的背后,未尝没有其现世的关怀在内。通过对古代帝王的比较,尤其是对夏少康的大力褒扬,高贵乡公本人寄望成为一代中兴之主的理想昭然若揭“少康、殷宗中兴之美,夏启、周成守文之盛,论德较实,方诸汉祖,吾见其优,未闻其劣。……复禹之绩,不失旧物,祖述圣业,旧章不愆,自非大雅之才,孰能与于此?”最后,崔赞等人放弃了争辩,“悦服”于高贵乡公的论断,大约也闻到了史论背后浓浓的现实味道。

饶有兴致讨论古帝王优劣的高贵乡公,在即位之初也是辅政大臣讨论的对象。《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称“公神明爽俊,德音宣朗。罢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钟会对曰‘才同陈思,武类太祖。’”<sup>①</sup>钟会的一时兴到之言,虽然并不必要深究,但从高贵乡公即位后孜孜不倦地讲论经典及以卵击石地反抗司马氏专权来看,钟会的评价并无偏谬。钟会对于高贵乡公的评价,表面上看是出于司马师的鼓动,其深层原因正在于汉末以来品藻人物的时代风气。此种风气的根源在于东汉时期人才选拔的方式,“月旦评”充分展现出人物品评带来的舆论作用及其对选举产生的当下影响。与“月旦评”不同的是,帝王优劣论面对的是处于权力核心的帝王,因其采用优劣比较的方式,“今上”无疑是十分敏感的话题,因此所评论的对象大多从当下游离,品评指向古代帝王。然而看似与现实无关的古帝王评论,却折射出论者所处身时代的种种面相,实际上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

高贵乡公以帝王之尊评价古帝王,很难说没有一种自况在内。身处魏晋鼎革的特殊时期,虽然大势已去,仍夕惕若厉,其明知不可而为之地反抗司马氏专权与渴望成为中兴之主的理想构成了巨大的反讽。以此看来,《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对古代帝王的优劣评论,不仅是提供后世读者以稽古的材料而已,其中渗透着高贵乡公热血的有机生命,是研究高贵乡公和曹魏政治的重要文献,该文记载了整个论辩过程中的人物言行,全面而生动,尤其值得珍视。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称“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sup>②</sup>洵非虚言。

在高贵乡公之前,身为五官中郎将的魏太子曹丕已开创了与朝臣共论帝王优劣的先例。尽管还未登大宝,但此时曹丕与朝臣共论帝王,其性质与君臣共论并无二致。《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看似堂皇而曲折,其实不过是曹丕授意之下的一场闹剧而已,早在曹操病逝之前,曹丕就已觊觎帝位,从曹操“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sup>③</sup>的表白中,不难看出曹氏父子对代汉立魏的心照不宣。曹丕对古帝王的评价,今可考知者有汉文帝、汉武帝、汉昭帝等,均不无推崇之意。尤其对汉文帝,曹丕曾多次予以揄扬,其死后也被谥为“文”,这一历史现象背后富含深意。

曹丕《太宗论》比较的对象是汉文帝与贾谊,虽然并非帝王之间的优劣比较,不能径称为帝王优劣论,但似也可看成是帝王优劣论的一种特殊形式,一种变体。其以孝文帝为优的观点正是立足于对“时文学诸儒,或以为孝文虽贤,其于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的反驳,而当时文学侍臣们关于汉文帝的议论,其产生背景虽无史料可稽,但参照高贵乡公于太极东堂对群臣的咨问来推断,或许也正是曹丕讲论于“肃城门外”时主动提出的一个话题。<sup>④</sup>裴松之注引《魏书》又称“他日又从容言曰‘顾我亦有所不取于汉文帝者三:杀薄昭;幸邓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书囊为帐帷。以为汉文俭而无法,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矣。’”与所著《太宗论》文义不同,此为指摘汉文帝为政之失,细绎文义,可推知此时曹丕已登基,是在以一位执

① 《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第132页。

②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4页。

③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53页。

④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王沈《魏书》:“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外,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第88页。

政者的姿态取鉴于古。魏氏“三世立贱”，显示出对东汉政权旁落于外戚之家的主动规避<sup>①</sup>，而在曹丕看来，外戚擅权从汉文帝时代就已萌生。《魏书》中所称“三年之中，以孙权不服，复颁《太宗论》于天下，明示不愿征伐也”<sup>②</sup>，更显示曹丕以汉文帝自比，向吴、蜀宣示一种大国之君的心态。可见曹丕《太宗论》非一时一地所论的孤立作品，而是始终关注、一再讨论的热门话题。

此外，曹丕《典论》佚文还有一则论汉武帝，因其仅孤立地评价帝王一人，未有与他人的优劣比较，故置不论。另有一篇《周成汉昭论》，其论议的政治背景较《太宗论》更为复杂，还牵涉到曹植、丁仪等人的相关作品，本文将单设一节加以讨论，此不赘。

## 二、帝王优劣论与汉魏之际的私人讲论之风

私人讲论之风在战国时期早已形成，西汉时转入低潮，至东汉末又渐次兴起。在东汉以降的私人论议中，有关古帝王的评价成为重要题材，王充《论衡》可谓代表。在《宣汉》篇中，王充认为：守成之主，周不如汉，汉文帝、武帝明显优于周成王、康王；创业之君，周、汉相埒，汉高祖、光武帝与周文王、武王可以相提并论。至于《恢国》篇，王充则系统比较了周武王与汉高祖的开国大业：实力上，周武王面对的仅是纣之“一敌”，汉高祖面对的却是秦、项二家；道义上，周武王“以臣伐君”，汉高祖“不为秦臣”，在取得胜利后，周武王以钺斩纣，“悬其首于大白之旌”，汉高祖不戮二世、子婴之尸；从因承上来说，周武王的成功建立在周文王创业的基础上，而汉高祖“无尺土所因，一位所乘”，从草莽成就帝业。<sup>③</sup>可以说无论是成功之难，还是德行之茂，王充都力主汉高祖优于周武王，这就破除了时人对儒家圣人的迷信，树立了有汉一代的盛德，具有振聋发聩之效。

在王充之后，孔融有《周武王汉高祖论》，其对于周、汉两代开国君主的比较，一如王充之论：“武王从后稷以来，至其身，相承积五十世，俱有鱼鸟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吕公望形而荐女；吕后见云知其处；白蛇分，神武哭；西入关，五星聚。又武王伐纣，斩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婴而遗之，是宽裕又不如高祖也。”<sup>④</sup>此段出自《艺文类聚》所载，固非全文，仅以所存文字来看，孔融从符瑞、德行两方面对周武王、汉高祖进行了比较，后胜于前的观点不言已明。具体来说，在处理前朝君主的方式上，周武王显得暴虐，而汉高祖宅心仁厚，此论已见于王充《恢国》篇；而关于符瑞降临的问题，王充在《语增》篇也有论及“案武王之符瑞不过高祖。武王有白鱼、赤乌之佑，高祖有断大蛇、老姬哭于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义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龙颜隆准，项紫，美须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吕后于泽中，吕后辄见上有云气之验，武王不闻有此。”<sup>⑤</sup>虽未强调武王“相承积五十世”，高祖“一身修德”，但对汉高祖各种符瑞的胪列，却绝不亚于孔融所论。

《后汉书·王充传》注引《抱朴子》称“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sup>⑥</sup>当《论衡》经蔡邕在中原秘密传播时，孔融也是潜在的读者，其选择以周武王与汉高祖的比较为题，很可能便是受到了《论衡》的沾溉与影响。帝王优劣论受到的关注和热议，以及《论衡》一书在王充歿后的不胫而走，在孔融此论中可约略窥见。此外，孔融《周武王汉高祖论》可能还受到了班彪《王命论》的影响，史称班彪“既疾嚣言，又伤时方艰，乃著《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欲以感之”。<sup>⑦</sup>其论有云“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

① 参见周勋初《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② 以上有关曹丕引文俱见《三国志》卷二《文帝纪》，第88-89页。

③ 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98-300页。

④ 《艺文类聚》卷十二《帝王部》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⑤ 王充《论衡》卷七《语增》，第116页。

⑥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6册，第1629页。

⑦ 《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第5册，第1324页。

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sup>①</sup>与《王命论》相比,孔融之论虽为残篇,但已点出了汉高祖兴起的两大因素,班彪《王命论》旨在规劝隗嚣归顺汉室,疑孔融《周武王汉高祖论》也可能意在规诫曹操、袁绍、袁术等人,天命归汉,武力难以摇撼,惜资料残缺,无由确验。

与孔融相似的是,曹植也喜好纵论古今人物,史载他曾延请邯郸淳入座,在讲论之前做了一系列准备,洗澡傅粉,科头拍袒,跳舞击剑,大声朗诵俳优小说,完毕之后才进入讲论的正题,“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圣贤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诗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sup>②</sup>其论说内容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暂且抛开曹植对哲学、政治、军事以及文学的关注,单就第二项内容而言,正可见曹植对评骘古今人物的喜好,而且引文明确提到了其评论方法是“优劣”。现存曹植帝王优劣论凡两篇,其一为与其兄曹丕问题共论之《周成汉昭论》,另一篇为《汉二祖优劣论》,其中曹植以问对的形式比较了汉高祖、光武帝,认为光武帝胜于汉高祖。曹植主要从三方面立论:一是时势,肯定汉高祖在历史上巨大功业的同时,却认为汉光武帝所面临的时势更为艰难和复杂;二是德行,汉高祖“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而光武帝则“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三是人才,既肯定了汉高祖麾下人才济济的盛况及其用人能力,又突出和强调了光武帝的个人才能和主导作用。<sup>③</sup>

关于汉高祖与光武帝之间的优劣比较,并非始于曹植。据现有资料考察,仲长统已开启了这一优劣比较的话题。其《昌言》未能完整保存至今,但有佚文称“昔高祖诛秦、项,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讨篡臣,而复已亡之汉,皆受命之圣主也”,<sup>④</sup>显示了仲长统对两汉受命之君的关注。又据《金楼子·立言下》载“仲长公理言‘世祖文史为胜’,晋简文言‘光武雄豪之类,最为规检之风’。世诚以为子建言其始,孔明扬其波,公理导其源,简文宏其说。则通人之谈,世祖为极优矣。”<sup>⑤</sup>可知仲长统不仅将汉二祖相提并论,也曾予以优劣比较,认为光武帝优于汉高祖,可惜其论述文字未能留存。曹植《汉二祖优劣论》在撰成后不久又传至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手中,诸葛亮针对“曹子建论光武,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的观点,指出“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sup>⑥</sup>从正面肯定了汉光武帝麾下人才之盛,并从深层论述了高祖、光武与其人才集团之间的关系。

### 三、曹丕、曹植《周成汉昭论》蕴旨臆说

帝王优劣论在汉魏之际的兴起,固然与人物品藻的时代风气紧密相关,然而仅以根源于选官制度的乡间清议为由,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时人对古帝王优劣论的热衷。为什么是古代帝王?为什么是优劣比较的方式?笔者在上文尝试从君臣共论与私人讲论之风的复兴两方面进行梳理和阐释,两种风气下产生的代表作品分别为《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太宗论》与《周武王汉高祖论》、《汉二祖优劣论》。此外,还有一组作品名为《周成汉昭论》,其产生背景和撰述方式反映了君臣共论之风与私人讲论之风的交织和融合:关于周成王、汉昭帝比较的话题既上承班固和王充,又使用了优劣评价的新方式,以曹丕为圆心,至少包括曹植、丁仪在内的邺下文士各抒己见,其与《太宗论》的产生应具有相似的背景,很可能也是“肃城门外”曹丕集诸儒讲论、近似于君臣共论的产物。

王充《论衡·宣汉》称“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过周之成、康、宣王。”<sup>⑦</sup>旨在通过对周、汉两朝守成之主的优劣对比,以宣扬汉朝的盛德,然而其比较乃泛泛而举,并未聚焦在某帝王身上。此前班固《汉书·昭帝纪赞》则称“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孝昭

① 《汉书》卷一百《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2册,第4211页。

② 《三国志》卷二十一注引鱼豢《魏略》,第603页。

③ 《艺文类聚》卷十二《帝王部》二,第237-238页。

④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册,第955页。

⑤ 许逸民《金楼子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50页。

⑥ 李伯勋《诸葛亮集笺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7页。

⑦ 王充《论衡》卷十九《宣汉》,第298页。

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sup>①</sup>虽已具体到周成王与汉昭帝之间的比较，然而采取的却是“等美”式的评价，并未使用优劣法。至于汉魏之际，在一个特殊而微妙的政治情境中，催生出一批题材相同、观点各异的帝王优劣论。

汉末建安期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军阀混战中异军突起，逐步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随之而来的则是曹操地位和权势的上升，据《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元年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九年“自领冀州牧”，十三年“自为丞相”，十八年“自立为魏公，加九锡”，二十一年“自进号魏王”，<sup>②</sup>在曹操威权日益滋长的过程中，朝野谤议纷起，如周瑜称“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欲废汉自立久矣”，<sup>③</sup>曹操自言“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sup>④</sup>而处于涡流中心的汉献帝也忧患累积，四处掣肘，史载建安期间曾先后发生多起叛谋，无不以诛杀曹操为职志，其中董承之乱据说接受了汉献帝的衣带密诏。为了“分损谤议”，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曹操曾自比周公，“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丕、曹植等人的《周成汉昭论》当作于是年之后不久。

先看曹植《周成汉昭论》。该文现存于《太平御览》卷四四七，虽非全文，但一篇精华，应略具于此。文题虽为比较周成王与汉昭帝，却始终围绕周公来立论，全文169字，成王出现4次，昭帝出现3次，周公却出现了6次。开篇即以周公领起成王之事“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终，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己忠诚，称制假号，二弟流言，邵公疑之，发《金縢》之匱，然后用寤。”<sup>⑤</sup>同叙述成王之事以周公为主线一样，下文转而记叙昭帝之事，也是与霍光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的。通观全篇，曹植撰写此论的目的在于分析对待首辅权臣的态度和方式。“假制称号”的周公遭到成王的质疑，而权倾朝野的霍光却获得昭帝的信任，在此曹植不肯承认昭帝优于成王，所以不得不为成王之疑周公进行辩护，其持说有二：一是“昭帝所以不疑于霍光，亦缘武帝有遗诏于光。使光若践天子之位，行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帝，疑者非徒邵公也”；二是“且贤者固不能知圣，自其宜耳。昭帝固可不疑霍光，成王自可疑周公也”，此说显得较为牵强。文末称“若以昭帝胜成王，霍光当逾周公邪？”显示曹植此论是有辩驳对象的，而对方所持应即“昭帝胜成王”之论。

再看曹丕《周成汉昭论》。该文现存于《艺文类聚》卷十二，<sup>⑥</sup>首尾完整，结构清晰，论点鲜明。开篇即指出所论问题“或方周成王于汉昭帝，金高成而下昭。”接着以“余以为”总领下文，分别论述周成与汉昭，对比之意，不言自明。周成王生长于诗书、礼仪环绕的优裕自如的环境，“所谓沉湎玄流，而沐浴清风者矣”；汉昭帝则生长在一个被争斗、机心缠束的相对暗昧的环境中，“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成王直到打开《金縢》之匱，发现了周公请求代武王而死的册书，才幡然醒悟，而昭帝对霍光自始至终地信赖，不受燕王状告的影响，实属难能可贵。成王是“不亮周公之盛德，而信《金縢》之教言，岂不暗哉”，昭帝是“岂将有启《金縢》、信国史而后乃悟哉”，最后得出结论“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死，贤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曹丕所论的关键正在于“疑信”之间，他充分强调昭帝对霍光的信任，让见疑周公的成王相形见绌。

① 《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33页。

②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第380、383、385、387、388页。

③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第1262页。

④ 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原题“十二月己亥令”，载《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第32—34页。

⑤ 《太平御览》卷四四七《人事部》八八，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2册，第2057页。

⑥ 除《艺文类聚》引录外，《太平御览》卷四四七所载《典论》也有论周成汉昭的一段文字。两处文句多有相似处，观点却大相径庭。《类聚》所引262字，《御览》所引183字。论点均显现于文末，前论称“汉不独少，周不独多”，持“昭帝胜成王”之论；后论称“(昭帝)欲高隆周，岂不谬哉”，持“成王胜昭帝”之论。两相比较，前论更显深刻、全面，可能是在后论基础上修改的结果。严可均认为“《御览》删改，持论顿殊”，也不无可能。分别见《艺文类聚》卷十二《帝王部》二，第233页，《太平御览》卷四四七《人事部》八八，第2056页。

当位极人臣的曹操在建安初年被各种流言围攻时,他和身边的人以周公、霍光相比拟,强调周公对周室、霍光对汉室之忠,以此来衬托曹操的忠于汉室,以消解各种不利于曹魏的议论,曹丕兄弟的《周成汉昭论》应即在此背景下产生。无论是曹植以“周公之忠”为中心展开议论,还是曹丕以“汉昭之信”为基点进行评说,其目的显然都是声援曹操,申说“有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的合理性。

然而,曹丕、曹植的《周成汉昭论》撰写于同样的政治背景之下,为何立论却针锋相对?这可能需要从曹丕与曹植二人的关系上来解释,以曹植之自负,必不甘于在撰论时蹈袭前人,尤其是乃兄曹丕,因此在不影响核心政治观表达的情况下,有意与曹丕作对,是极有可能的。《周成汉昭论》之外,笔者还发现一处例证。《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原别传》载曹丕为太子时,在宴会之余当着众宾客提出君父孰先的问题,从曹丕对邴原观点的默认来看,曹丕应持父(孝)先于君(忠)的观点,而曹植则撰有《仁孝论》,主张仁先于孝,很可能便是以曹丕等人为论敌提出的。<sup>①</sup>

此外,丁仪也有《周成汉昭论》,与曹丕、曹植的《周成汉昭论》应是同时论难的产物,他的观点与曹丕相同,认为汉昭帝优于周成王。<sup>②</sup>此论篇幅虽不长,然而立论周密平实,显示出后出转精的特点。

如上所述,孔融《周武王汉高祖论》、曹丕《周成汉昭论》、曹植《周成汉昭论》、《汉二祖优劣论》、诸葛亮《汉二祖论》、丁仪《周成汉昭论》、钟会《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共七篇论文构成了一组独特的论文系列:其旨在评价历代帝王的行为得失,是为人物论;其选择评鹭的帝王一般不是“今上”,也大多不属于本朝,又为史论;其采用前后互为比较优劣的方式,与一般的帝王论又有所不同。

从《春秋》“微言大义”、《小雅》“怨诽不乱”,到魏晋士人对“言外之意”的追求,含而不露、隐而未发的言说方式,一直是中国文学、史学的重要传统;而迫于现实各种利害关系,在面对与政治有碍的敏感题材时,文人或史家通常会加倍小心,欲言又止,萦回曲折,因此,其中所蕴藏的深意需要后世研究者仔细揣摩。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所以“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sup>③</sup>援此以言,孔融、曹丕、曹植、诸葛亮、钟会等人的帝王优劣论,又何尝不是汉魏之际的一篇篇政论呢?孔融对汉政权肇兴之际各种符瑞的称说,隐含了向威胁汉室各路军阀的警戒;曹丕对汉文帝的既称道又批评,流露出他不同时期的王者心态;曹丕、植兄弟对周成王与汉昭帝之优劣的争辩,意含对曹操功高盖主之地位的辩护;诸葛亮就汉光武帝集团人才向曹植提出的驳难,寓含着他对蜀汉人才之盛的自况在内;<sup>④</sup>高贵乡公对夏少康的盛赞,昭示着他即位之初寄望成为一代中兴之主的理想。这些人物论既是史论,又是政论,不仅是史学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同时也是解读汉魏之际政治情势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曹丕、曹植、高贵乡公等人不同时期的政治心态,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这些史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大部分篇目仍逸出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在文献校录和解读上更是存在一些不应有的错误。如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于《周成汉昭论》一文解题云“曹丕、丁仪都写同一题目,必作于建安中。建安中期,有人提出‘方周成于汉昭,金高成而下昭’的论点。曹植他们不同意这一认识,展开讨论。丁仪依据史实,得出汉昭为优的结论。……可以想见,当时讨论

<sup>①</sup> 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的君父先后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3-247页。

<sup>②</sup> 丁仪《周成汉昭论》载于《艺文类聚》卷十二。其为曹植党羽,此论却附和曹丕,而与曹植持论不同,盖著论时曹丕、曹植尚未起争魏太子之事。

<sup>③</sup>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0-281页。

<sup>④</sup> 关于曹植、诸葛亮的创作心态,马艳辉指出“曹植作《汉二祖优劣论》是在建安期间,在政治上尚未受到魏文帝曹丕的迫害,在邺下文坛也很活跃,其贬低汉光武帝时的人才,可能暗含有抬高曹氏集团人才之意。诸葛亮作为以‘汉家’正统自居的刘备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却可能借称赞汉光武帝时的人才,来肯定刘备集团的人才。”其说可参。见《刘邦、刘秀之比较——从诸葛亮驳难曹植谈起》,《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是各抒己见，坚持论据，促进对事物理解的深入，有一定的意义。”<sup>①</sup>显然，校注者未能注意到曹植的立论与曹丕、丁仪相反，而是将三篇《周成汉昭论》等同起来，一概而论。又如魏宏灿《曹丕集校注》于《论周成汉昭》篇下云“此篇《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七录之，《全三国文》附《论周成汉昭》之上，以为是《典论》，并于此文后录有《周成汉昭论》。此篇与前文大同小异，今附录之，供参阅。”<sup>②</sup>曹丕论周成汉昭的文字现存两处，读后不难发现，其观点大相径庭，严可均已指出《太平御览》所引“持论顿殊”。<sup>③</sup>校注者未能分析导致差异的原因，反而误以为两篇文字“大同小异”，殊为失之。又如许逸民《金楼子校笺》于“诸葛亮曰”之下仅将“曹子建论光武，上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一句置于引号之内，而下文“时人谈者，亦以为然。吾以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何哉”则置于引号之外，本为诸葛亮的话，如此断句则无所归属；至于诸葛亮论的正文“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以下另行分段，致使文意割裂，面目全非，校注者大概未曾意识到其为一篇完整的帝王优劣论。<sup>④</sup>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在于，这七篇有幸留存至今的帝王优劣论文，尽管其中个别篇目已引起学者注意，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尚无人论及。倘学界于此已有广泛讨论，则校录和解读的错误自可避免。况且，这些帝王优劣论大多出于一流文学家之手，不仅富含史学价值，更具备文学研究价值，在整个古代论说文的发展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并得到相应地重视。笔者不揣谫陋，以期于抛砖引玉之效。

##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Debate on Good and Bad Emperors: Centered o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Wang Jingzhou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Abstract:** The debate on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ancient emperors arose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as a result of debating atmosphere between rulers and their ministers. *Tai Ji Dong Tang Xia Shao Kang Han Gao Zu Lun*, written by Zhong Hui, was the vivid record of the discussion between Gao Gui Xiang Gong and his officials. *Zhou Cheng Han Zhao Lun* was the result of discussion between Cao Pi, Cao Zhi and Ding Yi, all serving in the one and the same palace.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these argumentations reflected the revival of the discussing atmosphere among common people at the end of Han dynasty. Kong Rong's *Zhou Wu Wang Han Gao Zu Lun* was a response to Wang Chong's *Lun Heng*. The debates comparing Han Gao Zu and Han Guang Wu Di by Cao Zhi and Zhuge Liang wer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Zhong Changtong's *Chang Yan*. *Zhou Cheng Han Zhao Lun* by Cao Pi and others was the result of the speci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when Cao Cao rose to the center of power, illustrating the view regarding a treatise on history as exactly a political comment.

**Key words:** the debate on good and bad emperors, discussion between ruler and officials, discussion among common people, *Zhou Cheng Han Zhao Lun*

(责任编辑: 龙石)

①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  
② 魏宏灿《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4页。  
③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第1099页。  
④ 许逸民《金楼子校笺》，第949-950页。